

· 书籍史 ·

## 屠隆杂著《鸿苞》成书与传播考

王 萌 筱

**内容摘要:**晚明出版文化繁荣,三教思想盛行,很多文人著书谈论三教性理,屠隆杂著《鸿苞》即其典型。《鸿苞》的成书是从《广桑子》开始的累积性过程,贯穿了屠隆中晚年的林居生涯,与他的佛道修行及社交网络密切相关。《鸿苞》在屠隆生前未付梓,而从晚明到晚清,它被基于不同立场的刊刻者、藏书家、编选者等品评、剪裁与重塑。《鸿苞》写作与流传中受到的质疑与批判,展示了三教思想的多声部与争议性。其文本生成过程中作者自塑与后人他塑的错位,体现了受众的能动性 with 书籍阅读方式的多样性,折射出明清时期思想变迁中的多元面向。检视《鸿苞》的成书与传播,有助于考察晚明文人心态,并为沟通书籍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样本。

**关键词:**屠隆 《鸿苞》 三教 文本生成 传播接受

晚明时期出版文化蓬勃发展,儒释道三教思潮蔚然成风,很多文人热衷于著书谈论三教性理,屠隆(1543-1605)即其代表。他中晚年撰写杂著《鸿苞》,广谭“六合内外及三教事理”<sup>①</sup>。本文探讨该书的撰述、刊刻与流传,揭橥其文本生成过程中作者自塑与后人他塑的错位。考察《鸿苞》的成书与传播,将有助于理解屠隆在佛道修行中以及与人相交时的微妙心态,亦可借书籍的阅读接受史来观照明清三教思想的复杂面向。

现存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刻的四十八卷本《鸿苞》,篇幅甚宏,内容博杂,包括《三教至处》等性学文章,《荒政考》等经世之作,以及《义士传》等史传作品等等<sup>②</sup>。《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将《鸿苞》归入子部杂家类存目,视之为晚明文人好谈二氏风气中的典型作品,并将其他文

①屠隆:《与管志道书》,汪超宏主编:《屠隆集》第1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②前人对《鸿苞》庞杂的篇目和内容已有梳理(郭子品:《屠隆〈鸿苞〉性灵小品研究》,中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2-40页),此不赘述。

人阐扬佛教的论著归入“《鸿苞》之派”<sup>①</sup>。实际上,屠隆友人兼姻亲张应文所撰《鸿苞居士传》即称《鸿苞》“以参合三教为本”<sup>②</sup>,而在明季便有士人对《鸿苞》的三教论调提出尖锐批评。因此,本文承续《总目》提要之论,侧重屠隆著作及后世评价中与三教相关的部分。

学界有关屠隆的研究成果甚丰,前贤时彦讨论屠隆诗论文论、交游活动、思想心态等议题时经常征引《鸿苞》篇章<sup>③</sup>,但关于这部重要著作如何成书,仅有一些相对零星的论述<sup>④</sup>。本文首先通过细读屠隆书信等文字,梳理《鸿苞》从写作到秘藏的复杂历程,呈现这部杂著与屠隆中晚年宗教修行和社交生活的密切关联,并对前辈学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阐释。其次,还将探讨《鸿苞》的接受史,检视后世的刊刻者、藏书家与编选者如何品评、剪裁及重塑这部内容庞杂的著作。

### 一、文本的累积生成:从三教书《广桑子》到杂著《鸿苞》

屠隆,字长卿,一字纬真,号赤水、冥寥子、广桑子、鸿苞居士等,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任颍上、青浦县令,万历十一年迁礼部主事,万历十二年遭弹劾罢官,于次年重九还乡,此后林居廿馀载。屠隆一生著述鸿富,有诗文集《由拳集》《栖真馆集》《白榆集》,传奇《昙花记》《彩毫记》《修文记》,小品《娑罗馆清言》《续清言》,杂著《鸿苞》等作品传世。其中,《鸿苞》在屠隆生前未授梓,万历三十八年方由茅元仪(1594-1640)刊刻出版。关于《鸿苞》的成书,《总目》略云“此书乃隆晚年所著”;当代的

---

①《总目》评《鸿苞》“其言放诞而驳杂”,“大旨耽于二氏之学,引而加于儒者之上……盖李贽之流亚也”;复指出陈禹谟(1548-1618)所著《说储》“不出明人掉弄笔墨之习,中多阐扬佛教,大抵沿屠隆《鸿苞》之派”(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五、一二八,中华书局,1965年,第1076、1104页)。下文所引《总目》评语出于《鸿苞》提要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②张应文:《鸿苞居士传》,《鸿苞》卷首,《屠隆集》第7册,第3页。

③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7-406页。吴新苗:《屠隆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郑利华:《屠隆与明代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第51-59页。Mengxiao Wang, “Reconciling the Three Teachings: Tu Long’s (1543-1605) Self-Cultivation and Playwriting,” *Late Imperial China* 41, no. 1 (2020): 1-37.

④吴新苗:《屠隆研究》,第75-76页。郭子品:《屠隆〈鸿苞〉性灵小品研究》,第28-30页。汪超宏:《屠隆十二题》,《明清浙籍曲家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6-98页。

数种《屠隆年谱》观点不一,将其著成时间分别系于万历十七年和万历二十五年<sup>①</sup>。根据对屠隆罢官后与友人多封书信往来的爬梳,本文认为《鸿苞》的成书是从《广桑子》开始的累积性过程,贯穿了屠隆中晚年的林居修行生涯。

许多晚明文人以佛道修行为风尚,屠隆乃其中重要一员。屠隆万历七年至八年间在青浦任上,追随文坛领袖王世贞(1526-1590),奉王锡爵(1534-1611)之女昙阳子(1558-1580)为师修习佛道<sup>②</sup>,并开始阅读《高僧传》《真诰》等二氏典籍;后于万历十五年拜道士聂道亨、金虚中等为师,受“金液还丹大道”;晚年同高僧云栖株宏(1535-1615)、居士虞淳熙(1553-1621)参订出世大道,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长斋持戒<sup>③</sup>。

在中岁修行佛道的同时,屠隆亦开始从事三教书的著述。万历十四年春夏期间,罢官后的屠隆闭门冥心修行,并称于五月十五日“得人生希觐奇证”<sup>④</sup>。同年四月,屠隆即开始著书,参同经世出世之三教。在当年致汪道昆的信中,提到“首夏作一书,取三教之理,詮次大略”,而今“业已垂成,尚未敢出”<sup>⑤</sup>。约于同时,屠隆亦致信王世贞,言道:“近颇得证验,益助勇猛。闲中既无一事相关,无以送长日,稍取三教之理,参其同异,寻其要归,著为一书。”<sup>⑥</sup>屠隆此间尚有多封书信提及著书谈论三教一事<sup>⑦</sup>,至万历十

①秦皖春:《屠隆年谱》,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08页。徐美洁:《屠隆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4页。

②昙阳子的教义兼及佛道,但最终因白日飞升成仙而闻名于世。关于晚明文人的昙阳子信仰,参见贺晏然:《昙阳子信仰的建立:兼论晚明文人宗教的特点》,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③徐美洁:《屠隆年谱》,第74、102、222、266页。

④屠隆:《白榆集》文集卷十三《与君善》,《屠隆集》第4册,第475页。屠隆同时期不少书信中均提到得奇证一事,颇为自得。如《白榆集》文集卷十四《答方众甫》称:“迩来自觉道念长进,为圣贤所惑,颇有殊证。”《再与子愿》说:“顷蒙圣贤梦境证度。”(《屠隆集》第4册,第480、482页)屠隆虽未明言是何奇证,但似与昙阳子有关。王世贞在万历八年昙阳子化去之后,曾致信屠隆,言道:“足下但守先师戒,勿正勿忘勿助,一切爱憎烦恼,以外境待之,毋预灵台事,五载当自有奇证也。”(王世贞:《屠长卿》,《弇州山人续稿》卷二百文部,明刊本,叶五)

⑤屠隆:《白榆集》文集卷十四《与汪伯玉司马》,《屠隆集》第4册,第487-488页。

⑥屠隆:《白榆集》文集卷十四《报元美先生》,《屠隆集》第4册,第487页。

⑦屠隆:《白榆集》文集卷十四《与苏君禹》《答胡从治开府》,《栖真馆集》卷十三《与张肖甫司马》《与丁右武》,《屠隆集》第4册,第494、496页,第5册,第240、247页。

五年与王士性(1547-1598)的信中称“经世出世书,业脱稿三本”<sup>①</sup>。可见屠隆万历十四至十五年间,应当一直在写作这部三教书。

屠隆万历十四年冬致王穉登(1535-1612)的信中,即已提到《广桑子》的书名:“不穀挂神武冠回,杜门却扫,日以修禅悦为事,暇则间览异书,意有所到,率尔撰著文字数篇,名为《广桑子》。”<sup>②</sup>联系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说的“文字数篇”即是他一再提及的三教书。此后屠隆又数次提到《广桑子》,如万历十五年底致梅鼎祚(1549-1615)书信中,言及吕胤昌(1560-?)“且使使送《广桑子》至新都”<sup>③</sup>;万历十六年致赵用贤(1535-1596)信中明言《广桑子》即参订三教之书:“仆年来万念俱空,一丝不挂。闲中无以自娱,稍取三教理,参订和合,著为一书,号《广桑子》。”<sup>④</sup>“广桑子”之名乃是用孔子歿后栖神于东海广桑山、化身为广桑山真君之典故<sup>⑤</sup>,屠隆以此为号,彰显三教弟子之身份,并用作书名,表达和合三教之要旨。

至万历十七年,屠隆在致邹观光的信中始提及《鸿苞》之名:“道民年来以蒲团多暇,浏览八荒,参合三教,著为一书。析天人之微,以彻障蔽;章善恶之报,以警顽愚。以摆落为义,趣归逍遥;以澄汰为宗,理存清静。搜考奇闻,纪述灵迹。旁及世务,间谭艺文。阐发前修,颇多自得。分二十餘卷,名为《鸿苞》。”<sup>⑥</sup>此外,张应文《鸿苞居士传》也总结道:“(《鸿苞》)以参合三教为本,网罗宇宙古今,精入造化,散及名物。”<sup>⑦</sup>从作者及其亲友的陈述可知,《鸿苞》主旨即为参合三教,并搜集奇闻逸事、谈论世务艺文,当是在《广桑子》基础上增广篇幅之著作。《广桑子》在屠隆生前身后皆未单独刊行,因此其中具体有哪些篇章今已不得而知;而现存四十八卷本《鸿

---

①屠隆:《白榆集》卷十四《与王恒叔》,《屠隆集》第4册,第492页。王士性来信云:“足下三教书成,幸赐仆一览之。”(王士性:《与长卿》,朱汝略点校:《王士性集》尺牍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26页)

②屠隆:《栖真馆集》卷十八《再与王百谷》,《屠隆集》第6册,第370页。

③屠隆:《栖真馆集》卷十四《与梅禹金》,《屠隆集》第5册,第265页。

④屠隆:《栖真馆集》卷十八《与赵汝师司成》,《屠隆集》第6册,第364页。

⑤据《太平广记》载:“此东海广桑山也,是鲁国宣父仲尼得道为真官,理于此山。”(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十九“韩滉”,中华书局,1961年,第132页)屠隆《鸿苞》卷四一《因果》言:“乃孔子征异于尼山,栖神于广桑。”(《屠隆集》第10册,第1124页)

⑥屠隆:《栖真馆集》卷十九《答邹孚如》,《屠隆集》第6册,第416页。

⑦张应文:《鸿苞居士传》,《鸿苞》卷首,《屠隆集》第7册,第3页。



苞》中,有不少篇章以“广桑子”开头<sup>①</sup>,多为谈论经世出世之文,应为早期《广桑子》中的篇章。屠隆友人徐渤(1563-1639)《访屠纬真先生娑罗园有赠》诗中有“曾向鸿苞读广桑”之句<sup>②</sup>,亦可旁证二者之文本关系。

万历十七年屠隆著成“二十馀卷”的《鸿苞》之后,并未罢笔。相反,他笔耕不辍,不断扩大《鸿苞》一书的规模。现存四十八卷本《鸿苞》中不少自成体系的篇章作于此后,其作年可考者,如万历十九年撰《藿语》(见《鸿苞》卷七、卷八),以布衣之身建言政务军机;万历二十年前后撰《南北备倭策》(见《鸿苞》卷五),向当事者进献备战倭寇之策<sup>③</sup>。万历二十七年前后复管志道(1536-1608)的信中,屠隆道:“十年之间,夜卧不知几起,背汗不知几何,而竟以成书,积三十卷,妄自命曰《鸿苞》。”<sup>④</sup>可知此时《鸿苞》已有三十卷。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屠隆信中云“竟以成书”,但并不意味着《鸿苞》的撰著画上了句点<sup>⑤</sup>。屠隆生前未将此书付梓,在他去世五年后,即万历三十八年,茅元仪主持刊刻四十八卷本《鸿苞》,是为初刻本。从三十卷到四十八卷,或许不排除刊刻者重新编次、甚至将屠隆其他未刊稿<sup>⑥</sup>混入《鸿苞》刊本的可能性;不过笔者倾向于认为屠隆生前应该已经形成了四十八

①如卷二二《广桑子游》,卷二七《儒佛》,卷三五《物性》《调心》《调心有三难》,卷三七《供奉》《学道患有住》,卷四〇《览物》,卷四四《湖叹》,卷四八《高义》(《屠隆集》第8册,第588页;第9册,第754、997、1005、1006页;第10册,第1040、1043、1118、1238、1346页)。已有前辈指出《广桑子》与《鸿苞》的关联(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郭子品:《屠隆〈鸿苞〉性灵小品研究》,第29页。徐美洁:《屠隆年谱》,第219页),惜未详考。汪超宏认为《广桑子游》当是《广桑子》之“同文异名”(《屠隆十二题》,第96页)。

②徐渤著,陈庆元、陈炜编:《鳌峰集》卷十五,广陵书社,2012年,第425页。

③徐美洁:《屠隆年谱》,第252页。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卷二,第367页。

④屠隆:《与管志道书》,《屠隆集》第12册,第93页。关于屠隆与管志道书信往来的考证,参见汪超宏:《明代曲作二考》,《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第73页。

⑤屠隆在万历二十八年《清言叙》中道:“余于诗文外,纂一书,谭大人之际,命曰《鸿苞》,积二十卷。”(《娑罗馆清言》卷首,《屠隆集》第6册,第537页)此序作于复管志道书信之后,却言“积二十卷”,疑为“三十卷”之误,亦有可能是由于重新编排《鸿苞》卷次所致。

⑥屠隆晚年诗文学作品散佚者颇多,前辈学者已有辑考。如关于屠隆遗作《绛雪楼集》的考证,参见张萍:《屠隆〈绛雪楼集〉及佚文探考》,《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7-23页。

卷《鸿苞》稿本,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屠隆向管志道自述“积三十卷”以后,应该仍未停笔。这一点可以从《销夏言》的自述中得到印证:“余十五年来裁翰札,撰文字,无论长篇短章,多即至累百千万言者。率信笔一挥,未尝思索属草。所著《鸿苞》将藏之名山,传之不朽。”<sup>①</sup>文中言“十五年”与致管志道信中所言“十年”相比多出五年,可借此推测他晚年仍在持续写作《鸿苞》中的篇章。其次,茅元仪刊本《鸿苞》卷首附有屠隆姻亲张应文所撰《鸿苞居士传》,称屠隆遗作有“《绛雪楼》文部十卷、诗部十卷,并《鸿苞》四十八卷未受梓”<sup>②</sup>。若张说确凿,则屠隆离世之际《鸿苞》手稿应即有四十八卷。最后,据《鸿苞》刊本序作者黄汝亨(1558-1626)所言,《鸿苞》付梓时“全书未加诠择”,也就是说刊刻者应未予增删<sup>③</sup>。黄汝亨曾参与《鸿苞》的刊刻筹备工作(详见第三节),其说应当真实可信,且亦与张应文之说呼应。

从现存四十八卷《鸿苞》刊本来看,全书结构较为松散,似无前后统一的分卷排序标准<sup>④</sup>,但有史料显示屠隆生前曾“论次”过这部著作。据杜濬(1622-1685)记载,屠隆曾馆于海陵郡备兵使者署园亭,“时《鸿苞》尚未成帙,实论次于此,又作《昙花记》”<sup>⑤</sup>。可见屠隆在万历二十六年撰写《昙

---

①屠隆:《鸿苞》卷四五《销夏言》,《屠隆集》第10册,第1260页。有学者认为相较于《娑罗馆清言》,《鸿苞》中的《销夏言》《要言》“尚属于屠隆清言的试验阶段,于内容形式上都未臻成熟”,仅具备了“清言作品的雏形”(郭子品:《屠隆〈鸿苞〉性灵小品研究》,第104、107页)。考虑到《鸿苞》累积成书的特征,以及引文中“十五年来”的时间信息,可大致推算《销夏言》中部分内容的写作应与万历二十八年成书的《娑罗馆清言》约在同时甚至稍晚,也就很难说是试验阶段的雏形。

②张应文:《鸿苞居士传》,《鸿苞》卷首,《屠隆集》第7册,第5页。

③黄汝亨:《鸿苞序》,《鸿苞》卷首,《屠隆集》第7册,第2页。有学者认为茅元仪刊刻《鸿苞》时“由原来的二十卷扩增为目前所见版本的四十八卷。至于哪些篇章是扩增的,或只是将原书的卷次增益,则是不得而知。”(郭子品:《屠隆〈鸿苞〉性灵小品研究》,第29页)其说所言“二十卷”乃依据万历十七年《答邹孚如》书信,未留意万历二十七年前后致管志道信中有“三十卷”的说法,也忽略了屠隆晚年的持续创作以及黄汝亨序文中的说明。

④《鸿苞》并未按照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卷次,如万历十九年所作《藿语》收于卷七、卷八,而万历十一年所作《与王太初田叔二道友》收于卷四十。

⑤杜濬:《屠赤水先生著书亭小记》,《听松轩遗文》,《屠隆集》第12册,第486页。

花记》前后<sup>①</sup>,亦在詮次《鴻苞》中的篇章。筆者推測,或許正是在詮次過程中,屠隆對其部分舊作進行了整理,將一些已收錄於其他詩文集的文字再度編入《鴻苞》。因此,現存《鴻苞》中不少篇目與早期刊行的《白榆集》與《栖真館集》有重複之處<sup>②</sup>,從中可略窺屠隆晚年對舊作的選擇傾向。通過比對《鴻苞》與屠隆其他詩文集,現將其中重出篇目列為下表 1:

表 1 《鴻苞》與屠隆詩文集重出篇目表

| 《鴻苞》卷數 | 重出篇目          | 屠隆詩文集收錄情況              |
|--------|---------------|------------------------|
| 卷二七    | 《與陸平泉宗伯》      | 《栖真館集》卷十七              |
| 卷二九    | 《戒殺文示諸子》      | 《栖真館集》卷二五              |
| 卷二九    | 《戒殺放生文序》      | 《栖真館集》卷十               |
| 卷三〇    | 《放焰口疏》        | 《栖真館集》卷二三              |
| 卷三〇    | 《長水塔院記》       | 《白榆集》文集卷五              |
| 卷三〇    | 《重建天井寺募緣疏》    | 《栖真館集》卷二三 <sup>③</sup> |
| 卷三〇    | 《補陀洛伽山記》      | 《栖真館集》卷二〇              |
| 卷三〇    | 《補陀觀音大士頌》     | 《栖真館集》卷十一              |
| 卷三〇    | 《補陀洛伽山志序》     | 《栖真館集》卷十一              |
| 卷三〇    |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 《白榆集》文集卷五              |
| 卷三〇    | 《贈无尽灯上人序》     | 《栖真館集》卷十二              |
| 卷三九    | 《與虞長孺》        | 《栖真館集》卷十五              |
| 卷三九    | 《與趙汝師太史》      | 《白榆集》文集卷九              |
| 卷三九    | 《與田叔》         | 《白榆集》文集卷七              |
| 卷三九    | 《答汪文學》        | 《白榆集》文集卷八              |
| 卷三九    | 《再答馮開之》       | 《栖真館集》卷十九              |
| 卷四〇    | 《與聞仲連》        | 《栖真館集》卷十七              |

①關於《曇花記》作年的考證,參見汪超宏:《明代曲作二考》,第 72-73 頁;王萌筱:《屠隆傳奇〈曇花記〉自序全文的發現及作年考辨》,《長江學術》2018 年第 2 期,第 124-128 頁。

②《栖真館集》卷首鄒迪光序署萬曆十八年,《白榆集》卷首丁應泰序署萬曆二十二年,但《白榆集》中大多篇章寫作時間早於《栖真館集》,且兩個集子有部分重複(徐美潔:《屠隆年譜》,第 209、248、261 頁。吳新苗:《屠隆研究》,第 75 頁)。

③萬曆十八年刻本《栖真館集》該篇題作《重建天井寺募》(《屠隆集》第 6 冊,第 477 頁),闕“緣疏”二字。

续表

| 《鸿苞》卷数 | 重出篇目                | 屠隆诗文集收录情况                 |
|--------|---------------------|---------------------------|
| 卷四〇    | 《与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 《白榆集》文集卷十                 |
| 卷四〇    | 《答陆五台司寇》            | 《栖真馆集》卷十三                 |
| 卷四〇    | 《与张洪阳司成》            | 《白榆集》文集卷十                 |
| 卷四〇    | 《与龙君超》 <sup>①</sup> | 《栖真馆集》卷十九                 |
| 卷四〇    | 《与沈纯父》              | 《栖真馆集》卷十五                 |
| 卷四七    | 《上寿母太夫人九十序》         | 《栖真馆集》卷十一                 |
| 卷四七    | 《与陆与绳司空》            | 《栖真馆集》卷十五<br>(原题《与陆与绳司寇》) |
| 卷四七    | 《与王元美司马》            | 《栖真馆集》卷十五                 |
| 卷四七    | 《与冯开之》              | 《栖真馆集》卷十四                 |

如前所引,黄汝亨序文称《鸿苞》付梓时刊刻者对“全书未加詮译”,因此这些篇目应非后人补入,而是屠隆生前所编。表1中所列篇目虽未按时间或文体排序,但也并非全然杂乱无章。以卷三十为例,其所收篇章包含了序、疏、记、颂等各种文体,时间跨度从万历九年所作的《长水塔院记》到万历十七年所作的《放焰口疏》,而细察其内容则皆与佛教有关。在按文体分卷的《白榆集》《栖真馆集》中,这些篇章出现在不同卷次;而《鸿苞》将其汇于一卷之内,应是出于按主题归类的内在逻辑。此外,其他数卷中所收书信等文字皆有相当大的篇幅谈佛论道<sup>②</sup>,虽然其编排逻辑现已很难确知,但可以推论的是,屠隆将这些旧作选入《鸿苞》,应当体现了他对这些文章的重视。

《鸿苞》庞杂繁冗的形态在后世受到诟病,如《总目》即批判其“并所为杂文案牍同编入之,体例尤为恒订”。这种冗杂的样貌和恒订的体例,正是由于《鸿苞》成书乃是屠隆后半生不断创作与编次的累积性过程,甚或可以说直至屠隆离世,《鸿苞》可能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从最初的“三教

①与《栖真馆集》所收《与龙君超》一信相比,《鸿苞》所收版本末增“尊公为吏,蒲团工课时不废……某复何言”数句(《屠隆集》第10册,第1114页)。

②甚至表面上看似与佛道无关的《上寿母太夫人九十序》也写到自身“雅慕玄修,皈心禅悦”,将以修行报母恩,以与“人世凡母子”相区别(屠隆:《鸿苞》卷四七,《屠隆集》第10册,第1307页)。

统宗书”<sup>①</sup>《广桑子》到后来“六合内外及三教事理,无所不谭”<sup>②</sup>的《鸿苞》,屠隆的野心越来越大,著述的规模也不断扩张。然而,屠隆的野心也伴随着焦虑,以至于晚年对《鸿苞》手稿“颇秘之”,时人亦“勘识是书”<sup>③</sup>。下一节便将探讨屠隆的社交语境对《广桑子》至《鸿苞》成书及秘藏的影响,体察其间作者心态的微妙变化。

## 二、书籍生产之社会性:屠隆社交网络与《鸿苞》的写作、流传及秘藏

从《广桑子》到《鸿苞》的成书过程,皆与屠隆和晚明其他文人的交游息息相关。将屠隆的写作置于其社交网络中考察,有助于理解他为何在罢官后开始撰著三教书并急于求得友人认可,以及为何到晚年又秘藏《鸿苞》且终身未曾刊行。

首先,屠隆开始写作三教书与罢官后友人劝说其立言以求不朽有关。万历十三年汪道昆在给龙膺(1560-约1622)的信中赞美屠隆文才云:“屠长卿隼才,于此一跌,故知其穷而益工。”<sup>④</sup>这里的“一跌”指的即是屠隆去官一事。同年,陈文烛(1525-?)致信屠隆,鼓励他“以穷愁发愤,著书立言,勒成一家,副在名山,垂之千秋”<sup>⑤</sup>。面对友人的建议,屠隆的态度十分暧昧。在万历十四年复陈文烛的信中,屠隆首先指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之虚妄:“一日盖棺,空留功业文章,于白骨何知?白骨既朽,所谓不朽,亦虚语尔。”并进而表示他修行以来弃绝文字的决心:“大悔曩时之妄用其心于无益之地。思力划去浮虚,一求真谛……且将瘞智公之笔,烧君苗之砚。”<sup>⑥</sup>然而,我们应留意话语与实践的距离,屠隆并未真的就此弃绝文字,反而在同年致苏浚(1542-1599)的信中直陈:“友人沔阳陈玉叔书来,力劝弟修名山之业,著经世出世一书……夏日山居无事,业成此书。”<sup>⑦</sup>此处屠隆将著书起因径自归于陈文烛的劝说,与复陈之信中的立场完全不同。

屠隆着手撰写三教书之后,在不同场合仍时时流露出对穷愁著书、立言不朽的摇摆态度。如万历十五年致沈一贯(1531-1615)书信中,屠隆自

①屠隆:《栖真馆集》卷十八《答叶虞叔》,《屠隆集》第6册,第369页。

②屠隆:《与管志道书》,《屠隆集》第12册,第93页。

③张应文:《鸿苞居士传》,《鸿苞》卷首,《屠隆集》第7册,第3页。

④汪道昆:《龙君御》,《太函集》卷一〇一,明万历刊本,叶十六。

⑤屠隆:《白榆集》文集卷十三《与陈玉叔方伯》,《屠隆集》第4册,第473页。陈文烛原信今未见,转引自屠隆的转述文字。

⑥屠隆:《白榆集》文集卷十三《与陈玉叔方伯》,《屠隆集》第4册,第473-474页。

⑦屠隆:《白榆集》文集卷十四《与苏君禹》,《屠隆集》第4册,第494页。

陈：“欲垂空文以自见……即坎廪穷饿以死，死且不朽。”<sup>①</sup>而万历十七年回复邹观光的信则声称：“夫世人忧愁，或以酒色销之，或以宾朋博弈销之，或以山水花木销之。能文字者以著书销之，更规不朽，垂身后名……仆则不然，日以学道为事，对境忘情，以炼性地，遣物荡累，以养神明。久而销铄，中自空洞，空洞之中，一物不着。虽有忧愁，于何栖泊？偶有所得，托之著述，抒我素抱，写我灵襟，此不可谓之著书，而又乌知所谓穷愁乎？”<sup>②</sup>这段文字中屠隆标举了自身与世人的两个不同之处：其一，他通过学道已然忘情，无需借世俗之事来销铄忧愁；其二，他的写作只是学道之余偶有所得而形诸文字，并非因穷愁而著书以求不朽之名。然而，至晚年所作的《销夏言》中，屠隆又言：“所著《鸿苞》将藏之名山，传之不朽。”<sup>③</sup>这些前后不一的言论，正体现出屠隆后半生挣扎于修道与著书之间的矛盾心态<sup>④</sup>。

其次，屠隆交游与著述的关系，还体现在他写作三教书早期不断寻求友人的“印可”上。万历十四至十五年间，屠隆在很多书信中提到三教书的撰述，其手稿流传于友人之间。如万历十四年屠隆致信汪道昆，言“四顾寥寥，独念先生，某千秋知己，故欲手此书，急走新都，面受大教”<sup>⑤</sup>；又作《与汪司马论三教》，洋洋洒洒数千言谈论三教玄同之理，末言：“仆每慨三教之理晦蚀不明，以致其徒纷纷聚讼，迄无休息。先生博识多闻，灵心密纬，参订三教，要于统宗，筑室颜曰太函，取三氏书悉贮一室，翻阅研磨，而又清心寡欲，实语实修。今世之可与语太函者，非先生而谁？仆是用悉其平生愚见，综掣剖析，与先生试印证焉。先生不可无一言以复我。”<sup>⑥</sup>可见屠隆寻求知己印证三教见解之迫切愿望。万历十五年汪道昆复信，称许屠隆三教论“诚有味乎其言”，并对其三教书表示期待：“兼闻大有著作，业已成一家言。恍然出而私示之，庶几振我聋聩。”<sup>⑦</sup>同年底，屠隆提及吕胤昌将遣使送《广桑子》至新都<sup>⑧</sup>，或许即是奉汪氏观览。

在汪道昆之外，屠隆好友沈一贯和梅鼎祚也赞许了他的三教书。屠隆

①屠隆：《栖真馆集》卷十三《与沈少宰肩吾》，《屠隆集》第5册，第244页。

②屠隆：《栖真馆集》卷十九《答邹孚如》，《屠隆集》第6册，第416页。

③屠隆：《鸿苞》卷四五《销夏言》，《屠隆集》第10册，第1260页。

④详参王萌筱：《晚明文人屠隆的佛道修行与写作转型》，《文学遗产》2022年第2期，第132-144页。

⑤屠隆：《白榆集》文集卷十四《与汪伯玉司马》，《屠隆集》第4册，第488页。

⑥屠隆：《鸿苞》卷二七《与汪司马论三教》，《屠隆集》第9册，第757-758页。

⑦汪道昆：《屠纬真》，《太函集》卷一〇三，叶九至十。

⑧屠隆：《栖真馆集》卷十四《与梅禹金》，《屠隆集》第5册，第265页。

于万历十五年奉此书于沈一贯,并谦虚地表达了不安之意:“欲奉去先生一覽教,亦复裴徊久之。念舍肩吾先生,无可与语者。竟尔尘一夕观覽,幸不吝大惠药石,虚怀以请。”<sup>①</sup>尔后应是得到了沈之认可,因此在致陆光祖(1521-1597)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宣称:“昨沈肩吾一见印可,以为深得祖师言詮。”<sup>②</sup>而梅鼎祚读后更是盛赞道:“《广桑子》云海在胸,阴阳在手……味之即浹旬弥月,芬于其口,旨于其心。置三日不读,便觉舌本间强,形神不亲。”<sup>③</sup>从屠隆求其友声的书信及友人的积极反馈可以看出,三教书的著述与手稿流通已成为屠隆林居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屠隆友人并非皆赞同其三教论以及兼学佛道的修行方式,而其所作的三教书便成为回应友人责难、为自身宗教修行辩解的场所。屠隆曾声称自己“中岁兼学佛老,晚年壹意奉佛”<sup>④</sup>,但实际上直至晚年他仍然修行丹道,病重之时还盼望道士孙荣祖迎接登仙<sup>⑤</sup>。他的佛道兼修引起了不少非议。如万历十五年,王士性来信言:“至云既究禅观,更讲还丹,则仆不能无疑。谓三教之于世不能偏废可矣,而乌云能同?”<sup>⑥</sup>质疑屠隆兼修佛家禅观与道家还丹之举,并提出三教各异的观点,与屠隆参同三教说针锋相对。万历十六年,冯梦祯(1548-1606)亦致信屠隆,劝他断绝与玄门中人的来往<sup>⑦</sup>。

面对这些批评,屠隆经常援引陶弘景(456-536)及昙阳子等兼修仙佛、由仙入佛的古今宗师之例为自己辩解。如复王士性书中言:“重阳七真及吾昙阳大师,皆从仙悟佛,以佛修仙。”<sup>⑧</sup>致陆光祖、管志道的两封书信中亦有类似言论:“昙鸾菩萨求金丹于陶都水,而通明先生亦受五大戒于

①屠隆:《栖真馆集》卷十三《与沈少宰肩吾》,《屠隆集》第5册,第244页。

②屠隆:《栖真馆集》卷十三《答陆五台司寇》,《屠隆集》第5册,第252页。

③梅鼎祚:《答屠长卿》,《鹿裘石室集》书牋卷六,明天启三年(1623)玄白堂刊本,叶十七。

④屠隆:《鸿苞》卷二七《答张观察论佛老书》,《屠隆集》第9册,第763页。

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明文书局,1991年,第485页。贺晏然:《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30-38页。

⑥王士性:《与长卿》,《王士性集》尺牍下,第525页。

⑦冯梦祯:《与屠长卿》(两通),《快雪堂集》卷三五、三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92、555页。关于屠隆与冯梦祯就玄门之士展开的论争,详参徐兆安:《证验与博闻:万历朝文人王世贞、屠隆与胡应麟的神仙书写与道教文献评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3期(2011年),第269-271页。

⑧屠隆:《白榆集》卷十四《与王恒叔》,《屠隆集》第4册,第491页。



鄮县阿育王,古释道高流,未尝不交修互访,政不必如今之讲二氏者,水火戈矛也。”<sup>①</sup>“顷从异人授金液还丹诀,而奉佛悟禅,不离空观。昔陶通明故是修玄门者,乃梦佛授记为胜力菩萨,遂诣鄮县阿育王寺授五大戒。仆私心亦愿若是。”<sup>②</sup>有趣的是,这些书信中屠隆都向友人提及他所撰述的三教书,而此书的创作动机之一正是批判儒释道门徒聚讼互贬的现象<sup>③</sup>。据此可推知屠隆著书的部分动因正是回应友人质疑,证明兼学佛老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为自身的宗教修行提供理论支撑。

最后,屠隆终其一生未曾出版《鸿苞》,也是因为友人的劝诫加深了他对书中持论的自疑与对刊书图名的忧惧。万历十六年以来,随着《广桑子》的撰写,屠隆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友人流露出焦虑情绪,并表示不敢刊行此书。如万历十六年致汪道昆信中言道:“道民所著三教书,持论太多,恐不尽合祖师本意。自取泥犁罪过,梦寐时或惊汗赧赧,便欲急取而焚之。日向旦又复津津自宝其康瓠,以是故不敢遂行。”<sup>④</sup>同年致赵用贤信中亦云:“中窍破的,未必敢望三教圣贤点头。然直写胸中所得,提肝挈胆矣。但恐终非祖师西来之意,太泄太尽,殆未免理障,以故秘不敢出。”<sup>⑤</sup>这两封信中所表现出的心态如出一辙,一方面屠隆自认为修道有所得而津津自宝,一方面又虑所论不合圣贤之意而甚为忧惧。而万历十七年致邹观光的信中提及《鸿苞》云:“成而尚秘,未敢播之通都,意且藏之石匣。”并表示“今断不能寄览也”<sup>⑥</sup>,与早先主动向友人寄览三教书的态度已大相径庭。

至屠隆晚年,管志道复告诫他当秘藏《鸿苞》一书。万历二十六年前后,管志道致信屠隆云:“必无远播通都,姑皮之篋笥。古至人著书,多自道成名根尽后,子期未至,何急而击鼓以求亡羊为?”<sup>⑦</sup>管志道显然认为屠隆未达到“至人”境界,道未成而名根未尽,因此不应著书立说,妄增口业。至万历二十七年,管志道又进一步阐明自己劝诫屠隆勿轻出《鸿苞》的理由:“天盖不与风流之士,出性命之言以垂世也。风流既可以投俗韵,而谈性谈命,又可以博名高。末世诚笃之根寡,而狂伪之根多,孰不慕而效之

①屠隆:《栖真馆集》卷十三《答陆五台司寇》,《屠隆集》第5册,第252页。

②屠隆:《栖真馆集》卷十五《与管登之》,《屠隆集》第5册,第293页。

③屠隆:《鸿苞》卷二七《与汪司马论三教》,《屠隆集》第9册,第757页。

④屠隆:《栖真馆集》卷十七《与汪伯玉司马》,《屠隆集》第6册,第331-332页。

⑤屠隆:《栖真馆集》卷十八《与赵汝师司成》,《屠隆集》第6册,第364页。

⑥屠隆:《栖真馆集》卷十九《答邹孚如》,《屠隆集》第6册,第416页。

⑦屠隆:《清言叙一》,《娑罗馆清言》卷首,《屠隆集》第6册,第537页。管志道原信今未见,转引自屠隆的转述文字。



……若以性命之说,投狂伪根而哢哢然立标于世,则罪业不可量矣。愚为此惧,所以绝著述之念二十余年,必待天迫之而后起也。足下其亦增修德行,以养《鸿苞》流行之地,可矣。”<sup>①</sup>此处管志道将“风流”与“性命”对立起来,认为风流文士妄谈性命将招致罪业。管志道虽未明确批评屠隆,但从“增修德行”的劝诫中,可知对屠隆修行尚未认可。有趣的是,管志道论学著作《问辨牍》《续问辨牍》正是于万历二十六、二十七年间相继刊刻,汇编与友人谈论三教性理的往来尺牍<sup>②</sup>,屠隆来书也正因附录其中而得以保存。管志道一面刊行己著,一面规劝屠隆勿出《鸿苞》,似不无自相矛盾之处。而他对这一矛盾亦有清醒认识,于是向屠隆自陈其刊书乃是“天迫之而后起”,实则暗中标榜自身德行已具,有资格发表“性命之言”。

屠隆受到管志道训诫而更加焦虑,在万历二十六至二十七年间的两封回书中反复提及此事:“仆所著《鸿苞》,亦颇自谓窥见一斑。足下云:‘名根未尽,不许著书。’仆遂秘不敢出。”“方自疑惧中,得先生教云:‘名根未尽,不许著书。’遂愕然深秘,而不敢出。夫不佞之名根,尽乎?不耶?不能自知。观信笔而不属草,名根似乎甚轻;观临文而意津津,名根固知尚在。安敢谓其已尽也?……《鸿苞》宜秘而不宜出,明矣。”<sup>③</sup>可知管志道的训诫无疑加重了屠隆的疑惧。然而,他在《销夏言》中转而质疑管志道的言行不一:“著书立言,毕竟是名根。管登之云:‘俟名根已尽,然后著书。’其意盖以砭余也。然管君方著书,不知其名根已尽否?”复自辩道:“所著《鸿苞》将藏之名山,传之不朽,亦大都信笔而成者。自知才性疏率,名心颇轻矣。”<sup>④</sup>屠隆对管志道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又自谓撰写《鸿苞》时“名心颇轻”,显然仍是针对管志道关于“名根”的训诫而发<sup>⑤</sup>。而屠隆声称《鸿苞》将“藏之名山”,更是有意标举自身不欲借刊书以求名之清志。

尽管屠隆对管志道行止持有微词,但后者的规劝对他还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直到万历二十八年屠隆在《清言叙》中谈及《鸿苞》时仍耿耿于

①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丈书》,《续问辨牍》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8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73页。

②四库馆臣评此二集曰“虽为儒言,实则佛教”(《问辨牍四卷续问辨牍四卷》提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8册,第185页)。

③屠隆:《与管志道书》(两通),《屠隆集》第12册,第88、93页。

④屠隆:《鸿苞》卷四五《销夏言上》,《屠隆集》第10册,第1250、1260页。

⑤关于屠隆与管志道的交往与论辩,参见荒木見悟:《屠隆と管志道》,《日本中國學會報》第28集(1976年),第187-199页。

怀：“吴郡管登之遗书规我……余受其诚，秘焉。”<sup>①</sup>而屠隆最终的确接受了管志道的劝诫，终其一生未尝刊行《鸿苞》。友人的训诫之所以给屠隆带来巨大冲击，正因其呼应了屠隆长期以来对修行与著书之间矛盾的深刻体认，这从他万历十四年拒斥陈文烛关于立言不朽的建议中即已见端倪。《鸿苞》成书的十余年间，屠隆一直挣扎在这种矛盾之中，乃至临终时作偈云：“生平一过，多言多语。《鸿苞》等书，付之一炬。”<sup>②</sup>于辞世偈中嘱咐家人焚毁这部灌注后半生心血的巨著，可见屠隆对出版《鸿苞》的极度焦虑至死亦未化解，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部著作在他生命中的独特地位。

总之，从早期的三教书到渐渐成型的《鸿苞》，都不仅是屠隆抒发个人见解的载体，也是他与友人思想交流的产物。屠隆最初撰写三教书即在一定程度上缘起于陈文烛的鼓励，著述过程中亦不断寻求友人印可并为自身修行辩护，而最终在生前未刊行《鸿苞》也与管志道的规劝加深了他本身的忧虑有关。实际上，《鸿苞》在屠隆身后的刊刻也仍然与他生前交游密切相关。刊书者茅元仪乃屠隆友人茅坤（1512-1601）之孙、茅国缙（1555-1607）之子、茅维（1575-约1640）之侄<sup>③</sup>。而为《鸿苞》作序的黄汝亨乃茅国缙之友，撰写《鸿苞居士传》的张应文乃屠隆姻亲。《鸿苞》的写作、手稿流传，以及秘藏与刊行皆发生于屠隆的社交网络之中，体现了书籍生产之社会性。

### 三、《鸿苞》在后世的刊刻与重塑：以茅元仪刊本及屠继烈节本为中心

前两节讨论了《鸿苞》累积成书的历程及其社交语境，乃是作者生前对著述的自我塑造；本节将以茅元仪的初刊本和屠继烈（1817-1874）的节录本为中心，探索此书在后世的传播接受，观察后人如何评价乃至重塑《鸿苞》其书与屠隆其人。屠隆临终吩咐焚毁《鸿苞》等书，但显然家人并未遵其遗嘱。万历三十八年，茅元仪刊刻四十八卷本《鸿苞》行于世<sup>④</sup>。茅元仪自陈其刊书目的主要是“将以待士大夫之采择”<sup>⑤</sup>，而《鸿苞》问世后的

①屠隆：《清言叙一》，《娑罗馆清言》卷首，《屠隆集》第6册，第537页。

②黄汝亨：《鸿苞序》，《鸿苞》卷首，《屠隆集》第7册，第2页。

③万历二十九年（1601）茅坤病笃之际，茅维曾向屠隆索要丹药。次年，屠隆又应茅国缙之请，为茅坤撰写行状（徐美洁：《屠隆年谱》，第285、291页）。

④据考证，另有一种明刻四十八卷本，今藏于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图书馆，当为茅元仪刊本之翻刻本（秦皖春：《屠隆年谱》，第142页）。笔者未能获见。

⑤茅元仪：《报曾棠芾给事书》，《石民四十集》卷九四，明崇祯刊本，叶十四。

确被不少藏书家、出版家等采择编选。《鸿苞》从晚明到晚清的流传中,不同的读者基于各自立场采取各式各样的接受策略,有时甚至与原作者屠隆的意旨大相径庭,呈现出书籍阅读方式的多种可能性,并反映了明清时期思想世界的多元与变化,尤其是诸家对三教的不同态度<sup>①</sup>。

茅元仪在万历四十年的《报曾棠芾给事书》中,记录了刊刻《鸿苞》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留下了珍贵的“编辑手记”。书信中,茅元仪首先阐述他对屠隆才学的看法,接着具体解释刊行《鸿苞》的意旨:

长卿晚年,其所标榜而不可已者,此书也。天下士大夫罕睹其全本,长卿至易箠之时,欲付一炬。长卿之意深矣,然非能悟道而然也。使其书终不表见,则天下之疑长卿者益深,长卿之误天下者益甚矣。此非有所薄于长卿也?长卿之短,不妨与千古共之;长卿之长,不妨与千古共之……当镌《鸿苞》时,贞甫诸先生皆欲裁其冗杂,去其不经。去其不经,而长卿之才掩矣;裁其冗杂,而长卿之面目失矣。村妇薄妆,以临流苏,即不当于王孙少年,而里中之狹邪,未尝不羡而喜也。及傅之艳妆,习之容态,彼且自露其丑,而人皆唾之矣。此不肖之鄙见,所以宁全而无裁也。故其简策之际,略寓微意,条各为简,意各为类,将以待士大夫之采择也。<sup>②</sup>

由这段陈述可知,茅元仪选择违背屠隆遗愿而刊刻《鸿苞》,其意图乃是使“天下士大夫”得以目睹全本,通过这部庞杂的著作全面了解屠隆才学的瑕与瑜,并可从中“采择”所需。也正是因此,茅元仪与序作者黄汝亨等人对于是否保留书稿全貌产生了不同意见。由茅元仪书信中的讲述可知,黄汝亨等曾主张删汰《鸿苞》中“冗杂”“不经”之篇章。关于这一点,黄汝亨于序文中也委婉地表达了态度:“此编即称博雅功臣,而谓为长卿易简理得之书,不可也。”<sup>③</sup>虽赞其博雅该洽,但对其繁冗琐碎颇有微词。然而,茅元仪对这部杂著的态度则是“宁全而无裁”,认为唯有保留全貌才能展现屠隆之本来面目。最终,如第一节中已征引的黄序所称,在付梓时“全书未加诠择”。因此,如今存世的四十八卷本《鸿苞》当与屠隆离世之际所遗

①关于明代三教思想的多元性,参见酒井忠夫著,刘岳兵、何英莺、孙雪梅译:《中国善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6-298页。

②茅元仪:《报曾棠芾给事书》,《石民四十集》卷九四,叶十二、叶十三至十四。

③黄汝亨:《鸿苞序》,《鸿苞》卷首,《屠隆集》第7册,第2页。

书稿中的篇章一致<sup>①</sup>。

茅元仪既是《鸿苞》的刊刻者,又是其最早一批的阅读者之一。他虽婉拒了黄汝亨的删改主张,但对《鸿苞》中不同的篇章也持有褒贬不一的态度。一方面,他赞扬书中部分文章具有现实的功能意义:“《鸿苞》之可采而取,自一二狂歌外,如舆地图考,亦略而得其概,可以备职方者也;义烈诸传,亦激而得其体,可以备说苑者也;说鬼、说梦、说因果,亦畅达明快,可以备稗官者也。”<sup>②</sup>茅元仪推崇《鸿苞》中的《舆图要略》《义士传》等篇,认为可以供职方、说苑所用,而鬼神报应故事则可为稗官提供素材。这段话可视为前引“将以待士大夫之采择”一句的注脚。

另一方面,茅元仪批评《鸿苞》中谭理与经济的部分,尤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屠隆的三教论调:“其所秽而不可核,淡而不可茹者,无如谭理,而经济次之。其所诞而不可信者,无如合三教之说。夫三教未尝不可合也,今欲以世同出世,犹可言也。欲先假长生而后修三昧,亦何其贪婪无已而支离不祥乎?”<sup>③</sup>需要指出的是,茅元仪并非彻底否定统合三教的论点,而是批评屠隆欲借道悟佛的修行方式为“贪婪”与“支离”。他接着用相当长的篇幅解释道:

丈夫未回首耳,苟回首而左顾右盼,恐入玄则非无漏,遽入禅则难速证,亦何其多情也。因玄而入禅,如三藏所言,五百仙人一时证悟,商那和修得佛心印者,岂少哉?然当其入玄之时,亦未知禅耳。睹膏粱而不取,入穷谷,犯嶮巇,而拾草食,道之所不载也。长卿岂真能如是哉?淆两说而不断欲,设奇以骇人耳。长卿今悔晚矣。<sup>④</sup>

茅元仪批判屠隆修行的着力点主要有二:一是屠隆在佛道之间左顾右盼、贪求兼得,并不似古来由道入佛之修行者在修玄时尚不知禅的素朴心态;二是屠隆未能言行合一,修行佛道时不能断绝欲念,只顾掺杂佛老二氏之说以骇世人耳目。如上节所论,屠隆创作三教书的初衷之一,便是回应友人对其佛道兼修的质疑,证明自身宗教实践的合理性。而从茅元仪的批判来看,屠隆此目的不仅未实现,反而招来更严厉的批评,显示出作者意图与读者理解之间的鸿沟。

<sup>①</sup>茅元仪信中所言“条各为简,意各为类”,亦可理解为他编次过书稿中的篇目。由于《鸿苞》原稿今已不可得,因此很难确知他进行了多大程度的编订,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他未曾删减屠隆原作。

<sup>②</sup>茅元仪:《报曾棠芾给事书》,《石民四十集》卷九四,叶十二。

<sup>③</sup>茅元仪:《报曾棠芾给事书》,《石民四十集》卷九四,叶十二至十三。

<sup>④</sup>茅元仪:《报曾棠芾给事书》,《石民四十集》卷九四,叶十三。

在《鸿苞》的传播过程中,刊刻者茅元仪“将以待士大夫之采择”的愿望得以实现,一些藏书家与出版家对《鸿苞》的内容进行了别裁与编选<sup>①</sup>。如祁承燦(1563-1628)在万历四十八年编就的《澹生堂藏书目》中,不仅收录《鸿苞》,还单独析出其中部分篇章,著录于不同类目中。如将《輿地要略》(按:当为《輿图要略》)归入史部图志类,《销夏言》《藿语》《博蒐》《知命篇》《詹炎录》《广桑子游》归入子部小说家类,《琼笈考》《补列仙传》(按:当为《列仙传补》)归入子部道家类,俱注明“载《鸿苞》”<sup>②</sup>。这种别裁法体现了祁承燦所标举的“流通于四部之内”的编目理论,乃是将同一部书中的单卷或同一部丛集中的单书按内容裁出,分别著录于不同四部类目之下,“以便检阅,是亦收藏家一捷法也”<sup>③</sup>。

与藏书家的别裁相应,《鸿苞》并非总以整部书的形式流传。首先,《鸿苞》中的部分篇章曾被出版家摘录编选。如陆云龙(1587-1666)崇祯六年(1633)编纂的《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中,选择性地收录《鸿苞》中《海览》等七篇文字,与屠隆其他诗文中辑出的各体文章共同作为其小品文之代表<sup>④</sup>。陆云龙赞美《鸿苞》“搜玄觅秘,原古该今”,“概宙内之奇”<sup>⑤</sup>,择录其篇章乃是服务于“共成一代言,以表当代之色”<sup>⑥</sup>,即建构时代文学典范之目的<sup>⑦</sup>。其次,《鸿苞》中一些自成体系的部分曾有单行本刊刻流传,

①《鸿苞》刊行后被不少藏书家收藏,很多目录将其归入杂家类(祁承燦著,郑诚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9页。黄虞稷著,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7页。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五,第1076页)。而张岱(1597-1684)《石匱书》将《鸿苞》归入类书(《石匱书》卷三七《艺文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22页)。

②祁承燦著,郑诚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第397、469、503页。另外,《澹生堂书目》集部诗文评内著录有《鸿苞文论》一卷(祁承燦著,郑诚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第652页),却并非出自《鸿苞》,而是从《由拳集》中辑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鸿苞》在晚明的影响力,可以说已成为屠隆之标志(陈广宏、龚宗杰:《明文话叙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71页)。

③祁承燦著,郑诚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第43-44页。

④郭子品:《屠隆〈鸿苞〉性灵小品研究》,第26-27页。

⑤陆云龙评选:《翠娱阁评选黄贞父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明崇祯六年(1633)崢霄馆刊本,叶二。

⑥何伟然:《皇明十六家小品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卷首,叶十一。

⑦关于陆云龙选评小品之标准,参见顾克勇:《陆云龙与晚明小品文选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19-123页。

其可考者包括收于《鸿苞》卷六的《荒政考》以及卷七、卷八的《藿语》。《荒政考》乃万历十六年屠隆感于浙江灾荒而作,张应文《鸿苞居士传》提到有《荒政考》一卷行于世<sup>①</sup>,可知茅刊本《鸿苞》面世前应已有单行本流传。今虽未见其本,但可查知《荒政考》在清代被多部丛书收录,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俞森所编《荒政丛书》及道光二十五年(1845)东皋草堂所刊《水利荒政合刻》,而俞编《荒政丛书》又收入《四库全书》以及《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瓶华书屋丛书》等,影响很大<sup>②</sup>。此外,作于万历十九年的《藿语》在晚明亦有屠隆同乡四明李氏刊刻的单行本一卷,题名《屠纬真先生藿语》,卷末牌记“四明李氏友爱堂家藏原版”,国家图书馆有藏本(索书号:15336)<sup>③</sup>。因书中未标记具体出版年份,故未可确知该单行本是由茅刊本《鸿苞》辑出,或是据屠隆生前稿本为底本刊行<sup>④</sup>。值得一提的是,《屠纬真先生藿语》中凡遇“胡”“虏”等字皆遭涂抹<sup>⑤</sup>,显为清人篡改之痕迹。

《鸿苞》在晚清出现了一个重要节本,即咸丰七年(1857)时任章邱县令的屠氏裔孙屠继烈编刻的《鸿苞节录》。该本在晚清民国时期流传颇广,至今仍有不少传本存世,而前辈学者对其留意较少,以下详述其节录策略及后世流传情况。这部节录本通过倾向性很强的“采择”方式试图重塑《鸿苞》,并树立先祖屠隆忧国忧民的形象。在卷首的《鸿苞节录纪略》(下文简称“《纪略》”)中,屠继烈陈述了他编刻先祖著作的动机:“家藏钁板岁久散失,吴兴茅氏传本亦罕有存者。惧其久而湮也,图重梓者有年。”但由于“卷帙浩繁,力有未逮”,最终选刊了十卷本《鸿苞节录》<sup>⑥</sup>。屠继烈总

①张应文:《鸿苞居士传》,《鸿苞》卷首,《屠隆集》第7册,第5页。张应文还提到屠隆有《发矇编》一卷行世,《鸿苞》卷四一《发矇》或与之有关。

②俞森:《荒政丛书》卷三,文海出版社,198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1、177、185、682页。

③屠隆《藿语》对军政事务列出十九条议论,茅刊本中十九条分段未分节,而李氏刊单行本中则分为十九小节,并为每节加小标题。此外,两个版本中十九条的顺序也略有不同,如“辅主德”在茅刊本中位于第二条(屠隆:《鸿苞》卷七《藿语上》,《屠隆集》第7册,第190页),在单行本中则为第十一条(屠隆:《屠纬真先生藿语》,国家图书馆藏明四明李氏友爱堂刊本,又叶二十三)。

④屠隆友人安世凤于天启五年(1625)记述其收藏屠隆《藿语》手稿一册(安世凤:《墨林快事》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第424-425页)。

⑤屠隆:《屠纬真先生藿语》,叶一、叶九、叶十二等。

⑥屠继烈:《鸿苞节录纪略》,《鸿苞节录》卷首,清咸丰七年章邱县署刊本,保砚斋藏板,叶二。

括《鸿苞》内容道：“其书上下古今，纵横宇宙，包罗万有，囊括三才。为卷四十有八，目六百十二，大旨归于本末交修、体用咸备。立身治世之要，胥莫能外；而他所阐发，特其余也。”可见他认为《鸿苞》的主要贡献乃是“立身治世之要”，而其他内容仅为“其余”，与前文所述屠隆及其友人对《鸿苞》主旨的总结有很大差距。屠继烈还进一步构建了《鸿苞》成书的时代背景：“有明中叶，朝政边防，士习民风，日流于弛。公虽山林伏处，而国计民生，未尝一日忘于怀。故不憚指陈剴切，冀有补于当时。盖身立乎神庙之初，虑已周乎熹怀之季矣。使得竟所学，以救时拯俗，其勋业顾可量哉？惜乎道不行而仅以文著也。”<sup>①</sup>乃将屠隆描绘成处江湖之远而心忧天下之士，却因遭谗罢官而怀才不遇，只能以文名世。

为了塑造先祖这一形象，屠继烈在编订《鸿苞节录》时所选篇章大抵以实用之文为主。正如《纪略》所言，“择其尤切于身世之用者，辄手录之”，并强调“以《荒政考》入焉”<sup>②</sup>。其实，如前所述，《荒政考》本已收入《鸿苞》卷六。而屠继烈之所以特别突出《荒政考》，其原因他在《纪略》中也有暗示：“《荒政考》亦纂入《四库全书》，圣藻品题，昭兹来许矣。”<sup>③</sup>屠隆的《由拳集》《白榆集》及《鸿苞》等著作均著录于四库存目，仅《荒政考》因编入《荒政丛书》而被收录于四库史部政书类，四库馆臣赞《荒政丛书》可“俾司牧者便于简阅，亦可云念切民瘼者矣”<sup>④</sup>。从屠继烈重视《荒政考》可以看出他对经世致用之文的偏爱以及对四库择书立场的认同。《鸿苞节录》采择经世篇章的做法，一方面体现屠继烈重塑先祖形象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咸丰年间时局不稳、民生凋敝有关。屠继烈或许希望通过选刻《鸿苞》中针对晚明国计民生所提的建议，来实现自身于晚清时事中“救时拯俗”之目的。

必须承认的是，屠继烈节录本的样貌与屠隆写作《鸿苞》之初衷已相距甚远。虽然屠隆在颖上、青浦任县令期间确实施行了很多惠政，而林居时写作《荒政考》《藿语》等篇章也的确出于济世情怀，明末清初文人张岱（1597-?）曾评价屠隆道：“实具经济大才……济世干材，弃之沟壑，岂不重可惜哉！”<sup>⑤</sup>但从本文第一节的梳理可知，屠隆最初作《广桑子》之主旨乃谈

①屠继烈：《鸿苞节录纪略》，叶一至二。

②屠继烈：《鸿苞节录纪略》，叶二。

③屠继烈：《鸿苞节录纪略》，叶一。

④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第710页。

⑤张岱：《屠隆虞淳熙黄汝亨列传》，《石匱书》卷二〇三《文苑列传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20册，第149页。



论经世出世之三教,张应文对《鸿苞》的定位也是以参合三教为本。而《鸿苞节录》几乎将屠隆所有直接谈论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文字悉数芟除。四十八卷本《鸿苞》中以“广桑子”开头的篇章在节录本中仅保留了《物性》一篇,且屠继烈径将原文中的“广桑子”改作“隆”<sup>①</sup>,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鸿苞》与其早期形态——三教书《广桑子》——之间的关联。

屠继烈对《鸿苞》中三教文字的删汰,实际上呼应了明季以来屠隆三教论所遭受的种种批判。除了上文提到的茅元仪,明遗民王弘撰(1622—1702)也抨击《鸿苞》“尤淳淳于三教一理之说,乃其意实以尊佛”“尤排击宋儒不已”的做法<sup>②</sup>,四库馆臣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鸿苞》“大旨耽于二氏之学,引而加于儒者之上”的倾向。屠继烈虽未明言其动机,但将其放置在《鸿苞》接受史中来观察,可以推测身为屠氏裔孙的编者作出这样的删改或许也有回护先祖的考量。

屠继烈重塑《鸿苞》形态与再造先祖形象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据晚清政治家、外交家郭嵩焘(1818—1891)日记载,他于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二十日收到屠继烈赠送的《鸿苞节录》一部,并留下简短评语:“略仿子书标目,以论时政得失。”<sup>③</sup>郭嵩焘将《鸿苞节录》定义为政论之书,这与屠隆生前所标举的“浏览八荒,参合三教”之《鸿苞》竟似是两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了,可见节编者的重塑之功。

至民国年间,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屠继烈的删节本也引发了一些批评。如1914年《雅言杂志》刊登张靖专论《鸿苞》一文,十分赞赏屠隆“沟通儒释,不立同异”的观点,并摘录《鸿苞》所收与友人论三教之书信数条,文末提及《鸿苞》之节本云:“清乾隆间有某氏者,就全书节取十分之一刊行,名曰节本,而所取者皆书中附载如《藿语》之类,乃论时政之得失者。遗其精华而取其糟粕,是不可解。”<sup>④</sup>张靖所言节本,应该就是指屠继烈所编《鸿苞节录》,而误记其时代信息。他认为《鸿苞》中论三教之篇章乃是“精华”而政论文字则为“糟粕”,与屠继烈的编选标准恰恰相反,无怪乎对节录本十分不满。此外,民国时期文艺界掀起一股晚明小品文热潮,作家与文学评论家阿英(1900—1977)1934年撰文评论屠隆小品文,提及《鸿苞

①屠隆:《鸿苞》卷三五《物性》,《屠隆集》第9册,第997页。《鸿苞节录》卷六下,叶十八。

②王弘撰撰,何本方点校:《山志》卷四《屠隆》,中华书局,1999年,第98、100页。

③郭嵩焘著,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8册,岳麓书社,2018年,第246页。

④张靖:《澄碧庵善知识记》(记四),《雅言杂志》第1卷(1914年)第10期,第8—11页。

节录》云：“为其裔孙继烈所编，收入者大都是‘尤切于身世之用者’。在这一准则之下，我想定然有一些可读的小品，受了残酷的删削之刑。节录本多政论，我殊不欢喜。”阿英推崇袁宏道“清俊飘逸”的小品，批评屠隆小品文“思想则不免迂腐”<sup>①</sup>，而对节录本中尤为强调的政论文字更是不喜。他将屠继烈的节选贬为“删削之刑”，从中可管窥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风向的转变。

总结起来，从初刊者到后世的藏书家与编者，他们其实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该如何处理《鸿苞》繁冗庞杂的内容？诸家对此采取了各式策略。序作者黄汝亨主张删汰冗杂篇目，而刊刻者茅元仪虽然对《鸿苞》中不同内容各有褒贬，但坚持不加诠释以呈现屠隆才学全貌，并留待后人采择。藏书家祁承燦从《鸿苞》中析出很多独立篇章，分别著录于不同的四部类目之下，以便读者检阅。后世出版者各取所需，选取《鸿苞》中的特定篇章，服务于树立文章典范或建言国计民生等目的。其中，裔孙屠继烈基于经世致用的立场，节录书中与立身治世相关的文字，并删减前人批驳的三教之论，对《鸿苞》进行了世俗化、实用化的处理，同时重构先祖屠隆经世济民的形象。而《鸿苞节录》在晚清民国时期得到的不同评价，又体现出《鸿苞》接受史的层递进程与多元取向。

#### 四、结论

《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向来是文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而更进一层来说，我们不仅要“读其书”，还要“知其书”。尤其在晚明以来大为兴盛的书籍出版文化中，更需考察一部著作从成书到传播的过程，不只将其作为研究材料，也要作为研究对象，关注书籍自身的历史。还应将书籍的生产放置于宏观的思想背景与微观的社交网络中来观察，这样方能更好地实现“以书存人”之目的，更加深入地知其人而论其世。

考证《鸿苞》成书与接受的复杂历程，可以沟通书籍史与心态史、思想史等不同研究领域。首先，通过《鸿苞》这一窗口，可以更深入地体察晚明文坛屠隆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鸿苞》的写作贯穿了屠隆中晚年的林居生涯，从最初的三教书《广桑子》到后来百科全书式的《鸿苞》<sup>②</sup>，皆与屠隆的宗教实践和社交网络密切相关，其累积性的成书过程体现了作者在佛道修

①阿英：《屠赤水的小品文》，《阿英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5、287页。

②限于史料，目前尚不能确证《鸿苞》中具体哪些篇章来自早期的《广桑子》。

行中自得而又焦虑的心态。其次,《鸿苞》在写作与流传中面临的种种批评,展现了明清士人对三教的不同阐释,有助于更细致地理解三教思想中的多声部与争议性。比如,王士性质疑屠隆参同三教之说,四库馆臣批判屠隆尊二氏于儒家之上,乃是从不同角度对儒释道关系提出各自的见解;而管志道规劝屠隆名根未尽不许著书,茅元仪抨击屠隆贪求兼得禅玄的欲望,又是对个体文人在三教思潮中应当如何从事修行与著述的反思。最后,《鸿苞》的传播与接受显示这部庞杂著作在后世如何被剪裁、利用乃至重塑的过程,其间作者意志与后人解读的错位体现了受众的能动性与书籍阅读方式的多元化。从广谭三教事理、网罗宇宙古今的《鸿苞》到侧重于立身治世的《鸿苞节录》,这部书的接受史也成为明清时期世风变迁的缩影。

拙文写作过程中蒙郭英德、吴佩熏、陈拓等师友帮助,并得到外审专家的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王萌筱,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文献与宗教。